

# 书刊发行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

黄晓华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晚清翻译小说的修辞策略有着较明显的“后现代”色彩。作为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中介,当时的书刊发行对这种“后现代”修辞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书刊编辑的视野决定了晚清翻译小说对原著及原作者的关注程度,书刊定位使翻译小说经常成为“可写文本”,而书刊读者接受水平的差异性则使翻译小说的意义不断“延异”。晚清书刊成为翻译小说实现“双重解构”的重要推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直接相关。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这种“后现代”修辞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被“现代性”规训。

**关键词:** 晚清翻译小说;“作者之死”;“可写文本”;“延异”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2)05-0088-05

自王德威提出“被压抑的现代性”<sup>[1]</sup>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俨然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然而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性”却没有随之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晚清翻译小说的巨大的历史存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作品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创作。据樽本照雄《晚清民初小说年表》统计,1902至1908年间,创作约有674种,翻译则有780种<sup>[2]96</sup>。但由于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这种存在的历史意义却没有被重视。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中,对晚清翻译小说的“意译”风尚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晚清翻译家之所以采用“意译”,“主要可以从当年整个的文化氛围和作家—读者关系的文学理想两方面来思考。前者使翻译家‘不能非不为也’,后者则使其‘不为非不能也’。”<sup>[3]625</sup>连燕堂则更直接地指出了晚清翻译小说的技术性缺陷:“一是许多作品都采用节译或意译,任意增删,甚至改写,加进一些原作中没有的内容。……二是体例不规范……三是改换包装,译的是外国小说,用的却是中国传统的

‘说部体段’。”<sup>[3]24</sup>在一定程度上,晚清翻译小说的这种缺陷与不足,正暗合“后现代”修辞的解构倾向。忽视原著作者,任意增删文本,以及曲解与戏仿等技巧,都与“后现代”翻译理论的“误读”与“偏离”相契合。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后现代”的“误读”与“偏离”,才使晚清翻译小说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晚清作家之‘误读’外来作品,虽然粗糙荒谬,却导致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创造发明。”<sup>[1]41</sup>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与翻译小说的“后现代性”直接相关。

然而,如同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被压抑一样,晚清小说翻译的“后现代性”更是被忽视。这种晚清翻译小说巨大的历史影响与其较低的史学评价之间的明显落差,显示出“现代性”视野对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性”的压抑。将晚清翻译小说的“现代”修辞与“后现代”修辞两种取向的命运进行对比,也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1909年,在绍兴商人蒋抑卮的资助下,怀抱“现代”翻译观念的鲁迅与周作人编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终于得以出版。他们怀抱现代

收稿日期:2012-06-02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修辞流变研究”(20090460965)。

作者简介:黄晓华(1973—)男,湖南隆回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与叙事理论研究。

文学观念,采用忠于原著的直译方式,但他们翻译的作品并不能获得读者认同,翻译出版的小说集销路极不乐观,仅在东京与上海各出售 20 册左右。其对文学史以及翻译史的影响,只是通过后来的“现代性”历史追述才得以确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懂外文的林纾意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则洛阳纸贵,影响深远。

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性”之萌生与发展,不仅与当时的文化氛围与作者—读者之间的文学理想相关,更与晚清的书刊发行直接相关。晚清以降,先觉者日益意识到书报作为“开明智”的重要手段的重要性,各种书社、杂志社、报刊风起云涌,层出不穷。“晚清的最后十年,至少曾有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sup>[1]2</sup>,小说因其通俗性而受到各种出版机构的格外关注,各种报纸、游戏小报、小说杂志、成书都是小说传播的媒介。晚清小说翻译与近代报刊的诞生基本同步。上海《申报》创刊一个月后,就刊登了英国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部分,译名为《谈瀛小录》。署名蠡勺居士的《听夕闲谈》自 1873 年 1 月到 1875 年 1 月连载于《瀛寰琐记》。百日维新之后,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揶揄下,翻译小说蔚然成壮观。1898 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先后连载自译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与学生周宏业译的《经国美谈》,鼓吹政治小说变革社会的巨大功效。1902 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继续鼓吹与引进“新小说”的范本。此后著名的小说刊物《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同样注重翻译小说。书刊发行作为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对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有着重要影响。

## 一、编辑角色与翻译小说的“作者之死”

晚清小说翻译家不尊重原著与原作者,显然与现代版权法规的缺场直接相关,但书刊编辑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当时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许多编辑都抱着明确的启蒙目的来编辑书刊,甚至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翻译实践的示范作用来引导小说翻译。梁启超 1898 年翻译的《佳人奇遇》连载于自己创办的《清议报》;包天笑 1901 年翻译的《迦因小传》发表于自己创办的《励学译编》;冷血(陈景韩)是 1904 年创刊的《新新小说》主编;周桂笙是 1906 年创刊的《月月小说》总译述;徐念慈则是 1907 年创刊的《小说林》专任译著编辑。这种身份混同对晚清小说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编辑,他们的目的与视野直接引导着当时的翻译活动。陈平原说到晚清

翻译小说的“创造性的误解”<sup>[3]641</sup>时,明确指出晚清翻译小说存在“对小说地位和作用的误解”<sup>[3]641</sup>与“对不同小说类型之价值高低的误解”<sup>[3]642</sup>,而这种误解与晚清小说书刊编辑的“启蒙”意向相关。为了凸显出自己钟爱的小说类型的社会作用,他们都会自然拔高自己翻译的小说类型的社会效应。因此,与梁启超推崇政治小说不同,冷血(陈景韩)关注虚无党小说,周桂笙痴迷侦探小说,徐念慈热衷科幻小说,但他们与梁启超一样,将自己关注的小说类型的重要性提升到能“新一国之民”<sup>[4]</sup>的高度。这就造成了晚清小说翻译以“类”取文的奇观。作为编辑,他们更关注翻译小说的类型及其对于自己所倡导的目的的重要性,而不是小说原作者的权威性;更关注小说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小说家的艺术成就。编辑的这种“目的论”倾向影响了翻译家的选介空间,直接主导了书刊的翻译取向。翻译家因此主要根据小说类型进行取舍,而不是根据小说家的艺术成就进行取舍。

与此同时,编辑的视野局限也使得这一时期对原作者的重视不可能落到实处。作为拓荒者一代,晚清翻译小说的编辑对外国小说的了解也是有限的。这不仅表现在语言的局限上,同样也表现在艺术鉴赏能力的局限上。晚清编辑与翻译家,精通外文的本来就少,如林纾之流全然不同外文,包括周桂笙等人在内的编辑兼译者,也只是略通日文,很多西方小说都是通过日文转译。就是梁启超这类精通数种外文的编辑与译者,其艺术引介也大多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艺术目的。在这种情形下,忽视原作者也成为一种掩饰译者对原作者所知甚少的时尚做法。

当这种怀抱启蒙目的同时存在视野局限的编辑参与到小说翻译的实务中来时,原作者的权威性进一步降低。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时用大段夹注来介绍历史事件,已经流露出编辑介入小说翻译的意图,作为编辑的梁启超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接受政治小说,介入到了作为翻译家的梁启超的工作。徐念慈用“觉我校”、“觉我润辞”、“觉我赘语”等方式,对《小说林》的译稿进行校改、润辞、批注,更是一种编辑对翻译的直接介入。而苏曼殊翻译《惨世界》时,编辑与翻译者甚至创作者的身份已完全混同。1903 年 8 月《国民日报》创刊,继承被封的《苏报》继续鼓吹革命。1903 年 9 月,从日本归国的苏曼殊出任《国民日报》的翻译,并于 10 月 8 日至 12 月 1 日的《国民日报》上连载“法国大文豪器俄著”的《惨社会》。为了配合《国民日报》宣传革命,从第七回开始,苏曼殊就直接偏离原著,加入自己的小说创作。

1904年,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惨世界》,扩充为14回,署“苏子谷、陈由己同译”。其中翻译与创作从回目上看,虽然各占一半,但从字数上看,翻译却仅占1/3。关于该文的作者(译者)究竟是谁,现在还是文坛一段未了的公案。如程文超根据柳亚子转述陈独秀的话“曼殊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我的润笔,更是妈(马)虎到一塌糊涂”,认为陈独秀只是作了文字上的修饰<sup>[5]</sup>。而连燕堂则认为这部作品是苏曼殊与陈独秀合作的产物,“这部作品,苏曼殊大致译到第七回,因为赴长沙参加华兴会的创建工作而暂离上海,于是陈独秀便接替他译下去,连载到十一回前半,报馆被封,被迫中止。次年,陈独秀又增补至第十四回,改名《惨世界》,署‘苏子谷、陈由己同译’,由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sup>[2]232</sup>。但不论哪种解释,都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编辑这一角色对小说翻译的重要影响。苏曼殊的出缺并没有使小说翻译中途夭折,而是可以由其他编辑续译。只要报刊编辑这一职位存在,这种续译就不会因人的更换而中止。这种续译与续作的被认同意味着原作者已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

## 二、报刊定位与翻译小说的“可写文本”

编辑的启蒙目的、视野局限与创作冲动,使得晚清翻译小说原作者的权威性降低,有时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形,如标翻译而实为创作的《自由结婚》,以及标创作而实为翻译的《回天绮谈》等。这种原作者权威性的降低,自然也导致了原作重要性的降低,由此使原作成为“可写文本”。

改写文本的倾向,与当时的文化氛围直接相关,而报刊作为当时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中介与桥梁,其社会定位对当时的文化氛围有着巨大影响。一方面,报刊定位提出了报刊对编辑的要求;另一方面,报刊定位也决定了报刊对潜在读者的想象。为了实现报刊的目的,书刊发行业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提升空间,由此才可能在获得最多受众接受的同时,实现启蒙目的,实现商业与事业的双赢。晚清翻译小说要面对的读者,一方面固然有着对新知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带着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这也就使得报刊发行业必须兼顾其求知欲与审美习惯,由此也使得晚清小说翻译表现出两种“改写”方式。

一种是增删原著内容。作为一种舶来品,外国小说中的人、事、物、理对于国人而言都是陌生的。为了让读者容易接受,从而更好地实现报刊传达“新知”的意图,译者经常需要对原著的内容进行改造增删。虽然政治小说的开民主之风、科

幻小说的新科学之智、侦探小说的肇法治之始、言情小说启自主之思,不同类型小说的“启蒙”目标各不相同,但翻译者要实现“启蒙”意图,不能不考虑受众的文化层次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正是因为这种受众与语境要求,使得包天笑与杨紫鳞在最初翻译《迦因小传》时,为了“保护”迦茵的道德形象,隐讳了迦茵与亨利未婚先孕的细节,只译了下半部,并在序言中谎称原著的前半部丢失了。两年后,林纾的全译本《迦因小传》补充了这一情节,但这种补全并没有给译者带来好评,而是招来了读者的批判。“林氏之所谓《迦因小传》者,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sup>[6]250</sup>,他的小说翻译,也因此被读者定性为“于社会毫无裨益”<sup>[6]251</sup>。包天笑为了报刊的“道德”定位而对原著进行了删节处理,而苏曼殊的《惨世界》则为了报刊的革命宣传大幅增加自己的创作内容。从《惨世界》第七回开始,苏曼殊依托原著构建的大背景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增加了一个独立创造出来的人物——明男德,以宣传革命主张。作者不仅借明男德之口,抨击了信奉等级制的“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sup>[7]</sup>与敬神、包脚等“极其野蛮”支那风俗,而且借明男德之行,宣扬坐而言起而行,借明男德之刀诛杀了欺压百姓的满周苟。这些革命主张与《国民日报》的社会定位直接相关。

另一种则是改造小说的叙述方式。读者的文化背景决定其接受翻译小说内容的难度,而读者的审美习惯则决定其接受翻译小说叙述方式的可能性。林纾采用桐城派散文风格翻译小说,为翻译小说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立下了汗马功劳。苏曼殊等人以白话译书,则明显迁就了“下层”普通读者的审美习惯。至于章回体与传奇模式,更是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的主导叙事方式。鲁迅早期译作《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都采用章回体,戛翼翬1903年从日文转译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为《俄国情史》时,不仅大量增删细节,而且将原文打乱揉碎,按照中国传奇小说的模式重新组合,同时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为当时国人更易接受的第三人称,以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

## 三、读者分化与翻译小说的意义“延异”

晚清小说译者根据书刊读者的文化背景与审美习惯来“改写”原著,正凸显出晚清书刊读者对小说翻译的制约与影响。这种文化语境使晚清翻译小说在修辞目的与修辞策略上都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在修辞目的上,译者引介外国小说的艺术目的与先觉者启蒙民众的政治目的以及书商追求利益的商业目的混杂在一起,尤其是当书社从

业人员同时兼任编辑、书商、译者身份时,更是如此。在修辞策略上,则是启迪新知与迁就旧习混杂在一起。这种混沌的修辞策略,自然也只会导致混沌的修辞效果。不同的读者从翻译小说中读到的东西不同,由此也使得晚清翻译小说的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延异”。

晚清翻译小说的译者与编辑都强调翻译小说“改良社会、激劝人心”<sup>[8]350</sup>的重要作用,为此译者与编辑都试图将所有翻译小说与社会意义挂上钩。但是,读者对翻译小说的接受却呈现出两极反应。当寅半生说林纾翻译的小说“于社会毫无裨益”时,陈熙绩则认为林纾译作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贵贱等级之宜平。若《战血余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sup>[8]350</sup>这种否定与吹捧虽然都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也可以见出当时读者对翻译小说接受分化之一斑。作为小说林社的老板之一,徐念慈对小说销售情况的统计分析,更客观地揭示出了当时读者分化的情况。“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八九,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sup>[9]335</sup>徐念慈由此得出判断,“余约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sup>[9]336</sup>

这种90%与1%的对比,真实地描绘出了晚清翻译小说的接受图景,同时也指示出了晚清翻译小说意义“延异”的两种路向。一方面是90%的读者的旧的审美习惯与知识背景对翻译小说的巨大同化作用,由此使得翻译小说“随波逐流”。在晚清小说创作中,处处可以看到翻译小说的影响与变形。如政治小说向谴责小说的变异,科幻小说与儒道思想的合流,侦探小说向黑幕小说的滑动,写情小说向鸳鸯蝴蝶的突进等。尽管这种“创造发明”显示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萌生时的丰富场景,但其内核还是折射出传统文化与审美趣味对理解与接受翻译小说的巨大同化作用。

然而,对具有新思想、新才力尤其是懂外文的1%的新式读者而言,翻译小说则成为登岸之筏。他们沿波溯源,将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视为一种引路指南,指向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们打开了一扇窗,让读者知道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风景。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谈翻译小说对鲁迅的影响时,特别指出了翻译小说的“图示”作用。鲁迅因为看到了《新小说》上器俄(今译雨

果)的照片,特意购买八大本的英译雨果选集;受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影响,鲁迅翻译了《月界旅行》;受林译小说的指引,鲁迅与周作人阅读翻译了哈葛得的作品<sup>[10]</sup>。

书刊发行能成为晚清翻译小说“后现代”修辞兴起的重要推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直接相关。首先,现代印刷术使小说书刊的大量发行成为可能,这一“技术革命”为近代翻译小说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晚清书刊发行者的逐利冲动,是晚清翻译小说“后现代”修辞泛滥的直接动因。如王德威所言,“相形之下,晚清那批‘无行’的文人,对文学、象征资本的挪移运用,反较‘五四’志士更有‘现代’商业意识些。”<sup>[1]14</sup>为了商业成功,编辑经常鼓励翻译者“率尔操觚”。第三,晚清政府对文化出版市场控制力的弱化,为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保障”。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力的衰退,给予了书刊发行以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为各种书社的诞生打开了方便之门,持政治革命、下层启蒙、艺术传介等不同信念的书商都可以一展头角。这种技术发展、商业意识与政治语境为晚清翻译小说“后现代”修辞的兴起提供了一种含义混沌而自由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当时混沌初开的文化语境,使得当时的书刊发行者不得不承担“双重解构”的使命:一方面是解构小说原著,使其能够被国内读者接受;另一方面则是解构当时的社会文化,使其为新文化的诞生提供可能性空间。这种“双重解构”促成了晚清翻译小说“后现代”修辞的诞生与“繁荣”。正是因为其泛滥成河,才引起诸多读者对源头的关注,从而推进了新一代译者的诞生。在读者与译者的这种轮回发展中,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逐渐规训成“现代”修辞。

## 参考文献:

- [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 [3]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 [4]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G]//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0.
- [5]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05.
- [6]寅半生.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G]//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7.

[7] 苏曼殊. 苏曼殊小说诗歌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48.

[8] 陈熙绩. 《歇洛克奇案开场》叙[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 觉我(徐念慈). 余之小说观[G]//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 周作人. 关于鲁迅[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456.

## Publishing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and the "Postmodern" Rhetoric in Translation Novel of Late Qing Dynasty

HUANG Xiao-hua

(Hubei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bei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rhetoric strategy of translation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has obvious "postmodern" quality. As the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author – translator and readers, the publishing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had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rise of "postmodern" rhetoric. The view of the editors decided the degree of concern on the original novels and writers, the social orientation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often made the novels "writable text", and the different level of readers acceptance made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novel continuously "difference". The result that books and periodicals worked as an important impetus for translation novel to realize "double deconstruction" has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text at that time.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context, this kind of "postmodern" rhetoric has accomplishe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and been gradually disciplined by "moderni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novel in Late Qing Dynasty; death of writer; writable text, "difference"

[责任编辑:郑红翠]